



张鸿勋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跨文化视野下的敦煌俗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张鸿勋 著

张鸿勋

跨文化视野下的敦煌俗文学

上海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鸿勋跨文化视野下的敦煌俗文学 / 张鸿勋著. —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4. 11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ISBN 978-7-5325-7396-7

I. ①张… II. ①张… III. ①敦煌学—通俗文学—文
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①I207.7-53②K870.6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06174 号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

张鸿勋跨文化视野下的敦煌俗文学

张鸿勋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上海瑞金二路 272 号 邮政编码 200020)

(1) 网址: www.guji.com.cn

(2) E-mail: guji1@guji.com.cn

(3) 易文网网址: www.ewen.co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经销

上海惠顿印刷实业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4.125 插页 2 字数 368,000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100

ISBN 978-7-5325-7396-7

I · 2857 定价: 58.00 元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公司联系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委会

- 主 编：郑炳林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所长、教授）
编 委：樊锦诗 （敦煌研究院院长、研究员）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郝春文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院长、教授、
 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会长）
 柴剑虹 （中华书局编审）
 赵和平 （北京理工大学教授）
 郑阿财 （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罗世平 （中央美术学院教授）
 张涌泉 （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邓文宽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
 高田时雄 （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
 波波娃 （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所长、教授）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郑炳林

敦煌莫高窟“藏经洞”，是 20 世纪古文献四大发现地之一。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敦煌文献主要部分流散到了国外，分别收藏在英国、法国、俄国、日本等国家，劫余部分收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原北京图书馆）等单位。由于敦煌文献收藏的国际性，“敦煌学”一出现就成为一门国际显学，长期引领着国际学术潮流。敦煌文献内涵博大精深，敦煌石窟艺术内容丰富多采，作为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一直受到中外学术界的极大关注。

中国敦煌学研究的起步基本始于敦煌文献的发现。中国学者最早从事敦煌学研究，是 1904 年金石学家叶昌炽至酒泉，从汪宗翰等人手中得绢本《水月观音》、《地藏菩萨像》及写本《大般若经》、《开益经》等，均作了考订，将有关见闻写入《语石》及后来撰写的《邠州石室录》中。后来由于王国维、罗振玉、蒋斧等进入，中国敦煌学研究掀起第一个高潮。而中国敦煌学的真正兴起是 20 世纪 80 年代，随着改革开放春风吹起，敦煌学迎来了自己的新生。到目前为止，中国敦煌学研究已经走过百年的学术历程，中国敦煌学界经过最近 30 年的努力，彻底改变了“敦煌在中国、研究在国外”的局面。在中国敦煌学百年研究的历程中，涌现出了一批著名的专家学者，出产了一批影响巨大的研究成果。在中国敦煌学研究的百年之际，需要对百年来中国敦煌学界的研究工

作进行回顾和总结,并对今后的研究进行展望。由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利用“985工程”平台经费资助,邀请中国敦煌学界30余位专家,选取他们具有代表性的学术论文,以“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名义,结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为中国敦煌学界研究之参考。

作为该项工作发起单位的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是改革开放的产物,敦煌学也是兰州大学的重点学科。早在1979年,兰州大学就建立敦煌学研究机构,1983年筹建敦煌学专业资料室,创办了敦煌学专业期刊《敦煌学辑刊》,建立敦煌学硕士学位授权点,1985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兰州大学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1986年通过教育部申请到美国基督教亚洲高等教育基金会的资助,1998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学位授权点并成为甘肃省重点学科单位,1999年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成为首批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基地,2003年建成敦煌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007年兰州大学敦煌学成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敦煌学还是兰州大学“211工程”、“985工程”建设的重点学科,先后投入经费1400万元进行重点建设,使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资料建设、学术交流等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并逐步发挥其优势,在国内外敦煌学界起到了引领研究的作用。近年来,兰州大学与敦煌研究院通过联合共建,实现了优势互补,这一优势在双方的研究成果和博士生的培养中得到了体现。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与美国密歇根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中心(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ichigan)、耶鲁大学东亚研究会(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Yale University)、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东方文献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早稻田大学艺术学院、台北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南华大学敦煌学研究中心、成功大学等机构在学术交流、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等方面进行合作,与耶鲁大学联合筹建了国际佛教艺术与文化研究中心(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hinese Buddhist Art and Culture),以促进本学科向“国际化”的进一步发展,提高兰州大学敦煌学专业的培养水平。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 1985 年建立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兰州大学资料中心,目前拥有中外文图书 7 万余册,在本学科的科学研究的、人才培养和对外交流上发挥了巨大作用。不仅保证了敦煌学专业的科研教学,同时也对敦煌学界提供服务。研究所还创建了敦煌学资料信息服务中心网站,在条件成熟后将可为整个学术界的研究提供网上信息服务。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拥有除本科以外齐全的人才培养体系,拥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博士授权点,积极为学术界培养人才。到 2010 年为止,出站的博士后 4 人,毕业博士 54 人,14 人晋升教授,其中 5 人任博士生导师,20 人晋升副教授,33 人获得国家基金项目支持。十余名博士生得到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资助,赴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密歇根大学、印第安纳大学,日本京都大学、九州大学,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等深造学习,一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两人博士学位论文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同时还为中国港台地区和国外培养敦煌学研究人才,先后招收的学生有读博和短期研修两种形式,主要来自于中国台湾地区南华大学,韩国国立首尔大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京都大学、东京大学、九州大学、青山学院大学、成城大学、东北大学、东京艺术大学、东京女子艺术大学、龙谷大学,美国密歇根大学,前后接收学生四十余人,其中毕业的博士生 2 人,这些学生普遍得到派出单位的好评。

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承担国家、教育部、国家文物局、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教育部文科重点研究基地和国际交流基金项目一百二十多项,经费一千多万元,陆续推出了“敦煌学研究文库”、“敦煌学博士文库”、“西北史地文化研究文库”、“国际敦煌学丛书”、“丝绸之路研究文库”、“敦煌归义军史专题研究”、“法国汉学精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

等丛书,即将启动的有“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和“敦煌讲座”丛书。研究所编纂、出版的论著在学术界得到普遍的好评,分别获得中国国家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甘肃省优秀图书奖、中国藏学研究珠峰奖、甘肃省社科优秀成果奖多项,研究成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等。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的发展是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扶持的结果,也是中外敦煌学界各位专家扶持的结果。由此,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也是敦煌学界的共同学术研究基地和交流平台,希望在今后的发展中各界继续给予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更多的支持。

因敦煌研究的特殊性质,遵照专家的意愿和实际需要,本丛书论述性著作一般以简体出版,以方便阅读;考据性著作以繁体出版,以避免录文和释文的歧义。由此繁简混合出版带来的丛书格式不统一,希望读者给予谅解。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酝酿、发起和实施,得到了很多专家的支持和帮助,特别是老一代敦煌学家的支持和帮助,否则很难有这个项目的实施。丛书出版得到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该社出版的俄藏、法藏敦煌文献,对敦煌学发展起到重要的作用。丛书的诸位编委,也为“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的出版付出了很多劳动,对此表示真挚的感谢!

学 术 自 述

面对这样一个题目，我踌躇了。不错，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我闭门操觚，写过一些探讨敦煌俗文学的文章，但材简识陋，发表过的东西是否能达到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水准，实乏自信。于是想，与其要自述什么“学术”，还不如说说在五六十年代，自己遇到过什么机缘，以什么样的方式寻师求知，逐渐走进敦煌俗文学这块园地的，或许更能反映我的实际情况，以及某些认识。

说到这个问题，就与我早年养成的课外阅读有关了。上世纪五十年代，我还在西安读中学。那时中学生的课程门类、作业布置、考试检查、升学压力等等的负担，远远没有现今中学生那样沉重，所以课外暇时，还有机会跑跑书店，逛逛旧书摊，找一些感兴趣的杂书读读。这阅读也并没有什么系统或一定的目标，只要是能找到手而又引起兴味的，往往不加选择地翻读，不过总以文史方面为多。就是在这杂乱无章的阅读中，偶然在一家旧书店里找到早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万有文库》中讲考古知识的一本小册子，里面却收有王国维的《敦煌发见唐朝之通俗诗及通俗小说》。文不长，却介绍了传自英国伦敦图书馆收藏的若干敦煌写卷，引录了韦庄佚诗《秦妇吟》，七言唱本《季布歌》、“孝子董永”和“全用俗语，为宋以后通俗小说之祖”的“唐太宗入冥事”，以及“全用韵语，多集当时俗谚格言”的《太公家教》、曲子词《西江月》、《凤归云》等，虽为断简残片，却是启蒙我认识敦煌俗文学的第一课。

让我较多看到敦煌遗书的是《敦煌掇琐》。这是1925年作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二印行的一部书。它收录了辑录者刘复留学法国时从法国国立图书馆所藏敦煌写卷中转抄出的一百零四件文书。内有小说、杂文、歌赞、白话诗、书仪、历本、经疏、蒙书、状牒、转帖、田册、婚约、舞谱、韵书等等，显然比王国维单篇文章能较多地展示出唐五代时期西北某些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生活的历史面貌，也使我对敦煌遗书内容的丰富多样，有了进一步认识。而书中“前言”的一节话，更触动我：

书名叫做掇琐，因为书中所收，都是零零碎碎的小东西。但这小字，只是依着向来沿袭的说法说，并不是用了科学方法估定的。譬如有两个写本，一本写的是一本《尚书》，一本写的是几首小唱，照着向来沿袭的说法说，《尚书》当然比小唱重要到百倍以上，《尚书》当然是大的，但切实一研究，一个古《尚书》，至多只能帮助我们在经解上得到一些小发明，几首小唱，却也许能使我们在一时代的社会上、民俗上、语言上得到不少的新见解。如此说所谓小大，岂不是适得其反？

刘复先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骁将，这样的看法，就一反此前敦煌学重经籍，轻社会，鄙民间的学风，把研究的目光引向重世俗，讲实用的社会领域，为敦煌学研究开辟出一片新境地，是有很重大意义的。这可以算是引导我走向敦煌俗文学道路的第二课。

这时候，我还读到了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上卷）》和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前者，使我认识了从汉代到中唐期间白话文学发展的历史；其中第九、“佛教的翻译文学”和第十一章“唐初的白话诗”等三章，则启蒙我认识魏晋以来佛教的译传对当时文学所产生的重大影响，

从而为唐五代俗讲与通俗诗的产生流行,创造了必要条件。后者,专注于先秦至清代为官绅鄙薄的俚曲小调、歌赋变文、宋金杂剧院本、诸宫调、弹词宝卷、子弟书等通俗文艺的形成、发展、重要作品、艺术价值等等的介绍,有考论,有实例,内容深入扎实,读后犹如听到一次古代俗文学知识的系列讲座,获益匪浅。而书中谈到变文发现的意义时说:“变文的发现,却不仅是发现了许多伟大的名著,同时,也替近代文学史解决了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如果不把‘变文’这一个重要的已失传的文体弄明白,则对于后来的通俗文学的作品简直有无从下手之感。”这样的指教,成了引导我从原先热衷宋元话本、明清小说向俗讲变文转移的机缘之一。

仍是五十年代,先后有三部研究俗讲变文具有奠基意义的资料集出版。一部是1954年12月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的周绍良编《敦煌变文汇录》。此书初版辑录了俗讲变文36种,第二年再版又增加两种。当然,在此之前,也有人辑录过这类作品,但都是零星的、分散的,专门汇集俗讲变文为一书的,当以此集为最早。而书前的“叙”,简明扼要地谈了敦煌遗存的发现,“前人对于变文之记载及述作”、“唐代俗讲与转变文”、“变文之体制”、“押座文”、变文之影响等,所收每篇作品,前面都有简要叙录,当时读后就有听到一堂俗讲变文知识普及课的感受,虽然以后又有了更好的此类辑本,但周先生筚路蓝缕之功,却是值得尊敬的。到了1957年5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王重民等六位先生编校的《敦煌变文集》,这是敦煌变文再现于世后海内外汇集此类作品最多、最全、最有学术价值的一部权威著作。正如书前“出版说明”所评介的:

过去国内也曾零星出版过一些变文的辑本。由于材料收集的困难,校订工作的繁复,那些辑本,不能满足一般读者和研究者们的需要。……本书系王重民、王庆菽、向达、周一良、启功、曾毅公

(依姓氏笔画排列)六位先生所合编。将国内外公私收藏的变文之类的东西,尽可能地分别拍摄照片或抄写,根据一百八十七个写本,过录之后,经过互校,编选了七十八种,计分正文八卷。篇中有旁证,篇末有校记,在争取保存原貌的要求下,力求读者阅读的便利。对于研究者的资料供应,本书应该被认为是从来变文辑本中最丰富的一部。

如此评价是毫不为过。此书搜集唐五代“变文之类”作品之多、辑录之广、校勘之谨,确是远超前人。事实证明,此书出版五十多年来,虽又有一些新的发现,做了些增补,还有一些学者对于某些作品文本的校订、字句的辨读等做过一些订误或商榷,但海内外凡研究唐代俗讲变文和语言文字者,无不取资于此奉为圭臬。而它确也不负众望,自出此书,唐五代俗文学研究迅速地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然,此书把敦煌所出各类讲唱文本笼统地归在“变文”一个类名之下,出现了争议,但追根溯源,这些老辈学者以其湛深的功力,为变文研究所做的搜集、整理、校勘等等基础工作,从而为后来者扫清了前进的一些障碍,是应该感谢的。与上述两书差不多同时出版的另一部著作,是王重民的《敦煌古籍叙录》(商务印书馆,1958年6月)。此书以传统的经、史、子、集分类,将自己三十年代在巴黎、伦敦为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选择拍摄敦煌古籍影片时所作的题记、考订,以及其他学者对敦煌四部书所写的题记论文等,或全录,或节录,或仅著录,汇为一编,供需要者参考,实是从事敦煌学者必不可少的一部参考书,我就是深受其惠者之一。

上世纪五十年代,还有两篇研究俗讲的力作,使我补上了当年未能及时读到的两次专题讲授课。一篇是孙楷第的《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见其《俗讲·说话与白话小说》,作家出版社,1956年6月)。孙先生精于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目录、版本之学,在敦煌学上也有精到的

研究。他这篇论文,撰成于三十年代,至四十年代初才印出。解放后又收入了他新编的论文集,再次面世。文中以“唱词”、“吟词”、“吟唱与说解之人”、“押座文与开题”几个方面,对俗讲仪轨与文本体裁,做了深入考察。论述的详赡,考释的精当,至今仍是这类研究的白眉。另一篇是向达的《唐代俗讲考》(见其《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三联书店,1957年4月)。这也是初发表于三十年代,后又屡经修订才定稿的论著。文中向先生以其渊博精深的学力,将佛经文学与唐代俗讲变文伎艺融会贯通,从“唐代寺院中之俗讲”、“俗讲之仪式”、“俗讲之话本问题”、“俗讲文学起源试探”、“俗讲文学之演变”五个方面,做了深入探讨。文中资料的翔实,考辨的周详,立论的允当,都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向先生一反向来认为俗讲仅源自佛家讲经说法,提出当源自六朝清商旧乐变歌,为俗讲变文之源在本土找到一条新思路。向先生在文中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说者亦有谓俗讲话本应一律称为变文者,试加复按,可以知其不然。《目连变》、《降魔变》、《王陵变》、《舜子至孝变》等多以变文名,固矣。然《季布骂阵词文》固明明以词文或传文标题之矣。而所谓押座文、缘起,以及敷演全经诸篇,非自有名目,即体裁与变文迥殊。今统以变文名之,以偏概全,其不合理可知也。

古人说:“读书做学问于无疑处有疑,方是进矣。”二十年代以来,学界以“变文”一名涵括敦煌所有说唱文学几已成定论,向先生却能不拘泥于陈说,通过深入考察敦煌所出写卷,针对文本原有标目、体裁、题材等实际的差异提出疑问,显示出一个严谨学者的思考勇气,而我就是在向先生疑问的启示下,走上了寻求答案的道路。

到了六十年代,出现了两篇似是回应向先生疑问的文章。一篇是

程毅中的《关于变文的几点探索》(刊于《文学遗产增刊》第十辑,中华书局,1963年3月)。该文就“变文的名称和来源”、“变文的体制和影响”、“变文的题材和意义”三方面,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变文之得名,大致可以认为和佛家所谓的变相有关,变文就是变相图的说明文字”。接着他却指出:“变文和变相有关,但是我们不能说这种文体也是在僧人演唱佛经故事以后才产生的。”因为:“变文就是变化的意思,如果说变相这个佛家术语是从梵文翻译来的,那也很可能是意译而不是音译。”他考察了变文的体制后,问道:“变文这种文学形式,主要是由汉语特点所规定的四六文和七言诗所构成的。难道这种最地道的民族形式可能是从印度传来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接着他又考察了《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著录的“杂赋十二家”,以及魏晋以来所见“叙事代言杂赋”与初唐张鷟“以骈俪之语作传奇”的《游仙窟》后,作出结论说:“变文作为一种说唱文学,远可以从古代的赋找到来源。”这样,“我们不宜笼统地以变文概括一切敦煌文学,更不该片面地把变文看作佛教文学,从而认为它是由外国的佛教徒传来的。”程先生的这些见解能否站得住,自可见仁见智,而其见解的独到、探求的精神、扎实的学风,却是值得肯定的。与程先生此文差不多同时发表的是周绍良的《谈唐代民间文学——读〈中国文学史〉中“变文”节书后》(文刊《新建设》,1963年1月号)。文章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对敦煌所出讲唱文学系统看作“变文”提出质疑:

自从敦煌石室发现了一批唐代民间文学的典籍后,经过半个世纪的研究,到了今天,依然笼统地把它认作“变文”。但从体裁上来看,其中显然有很多不同的地方。如果这样不加类别、区分,是不是恰当呢?……这是值得思考的。

之后,遂以《敦煌变文集》收录的讲唱作品为依据,条分缕析,追源溯流,归纳特点,辨别异同,一一进行探讨。这样贯通古今,明其变迁,比较内外后,提出过去所谓的“变文”,依体裁实有“变文”、“俗讲文”、“词文”、“诗话”、“话本”、“赋”六类的不同。最后他总结道:

唐代民间文学是丰富多彩的,各式各样的文体不独已经产生,而且极其美好。……如果把唐代民间文学都视之为“变文”,认为只有“变文”一种,那就贬抑了唐代民间文学的价值。

周先生这篇文章,不仅高屋建瓴从整体上对敦煌遗书中说唱作品做了新的审视和归类,引导读者思考唐代说唱文学体式的多样性、源流的多元化,而且在一些具体概念的阐释上,也是胜义纷出。如对变文之“变”字的解释,这是所有研究变文者歧见纷呈、莫衷一是的老问题,而周先生对此作出自己朴实真切的阐释:“要弄清‘变文’的涵义,并不需要多绕圈子去考证它,因为当初创造这一名词的人,未必经过考古证今地考虑后才提出的,相反地却是要创立一个名字,一定要从群众易于了解和接受的才好,故‘变’之一字,也只不过是‘变异’、‘改变’的意思,其中没有任何深文奥义。”这些对正在徘徊于敦煌俗文学园地的我,无疑是振聋发聩之声,得到的喜悦是难以言表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正当我沉醉在这种寻师求知的阅读时,不料“文化大革命”轰然而起,在一片乱批、乱斗、乱改中,哪里还许搞什么学术、什么论著,于是我这种学习办法只好戛然而止了。待重整旧业,已经是十多年以后的事情了。

上世纪初,敦煌学作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海内外学人“各就其治学范围,先后咸有所贡献”。他们的研究论著可谓多矣,而五六十年代的我,在知识的海洋面前,懵懵懂懂,加之各种条件的限制,面对这些博大精深的论著,并无力一一购读,错失过许多极富学术价值的论著

(最为遗憾的是,在当时根本没有条件读到台湾、日本等地学者的有关论著),就是读到不多的几种,也未必能完全理解和领会,常常会有买椟还珠之失,这在有识者看来,实为“井蛙不可以语海”,可是在我却是一段难以忘怀的回忆。只是由于自己学识的浅薄和不够努力,希冀向前辈学者论著中汲取有关学问的办法,实际上自己远远未能窥其万一。但饮水思源,我仍然十分感谢他们这种“润物细无声”的教诲。正是这些大多未曾谋面老师们的精深论著,一步步引导着我在敦煌俗文学园地里的耕耘,现在借此机会“自述”出来,且当刍荛之言吧。

目 录

当代敦煌学者自选集编纂缘起	郑炳林 1
学术自述	1
《天地阴阳交欢大乐赋》与日本平安时代汉文学	
——以大江朝纲《男女婚姻赋》为中心	1
敦煌俗赋《茶酒论》与“争奇型”故事研究	21
移植与变异：日本《酒茶论》与敦煌《茶酒论》的比较研究	50
从它山攻玉看俗讲变文研究的新拓展	69
敦煌遗书中的中印、中日文学因缘	
——读敦煌遗书札记	80
从唐代俗讲转变到宋元说经	
——以《佛说目连救母经》为中心	97
从印度到中国	
——丝绸之路上的睽子故事与艺术	115
汉译《百喻经》与印度古代民间故事	138
读《一千零一夜》札记	
——行旅在中、印、阿拉伯民间故事间	157